

第一章



► 清末中国政党思想的初步发育 ◀

从根本上说，中国早期关于政党的一切思想皆源于西方。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封建专制时代的中国没有政党，只有朋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士大夫、官僚由于出身、地域、社会关系，以及利益、政见乃至品行、学术见解的不同，自然会分化成不同的带有一定政治意义的派别，它们彼此之间相互排斥，直至相互敌视和攻击。在封建专制时代，由于缺乏政治公开的机制，这些政治派别没有群众基础，其活动缺乏公开性，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一般只为排除异己而运作，这就是所谓的朋党。我国的汉、唐、宋、明等各代都有朋党存在，由于受封建主流思想的排斥，在官方语言中，“结党”总是和“营私”、“乱政”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中国，“君子不党”的观念为历朝士大夫所推崇。

从发生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鸦片战争开始，反抗外国侵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反专制统治，争取民众自由独立便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旋律。政党，这一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产物，

随着“西学东渐”之气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并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逐步为国人所认识、运用，最终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几近成为主角。

一、西方政党观念和政党政治思想的输入与传播

按照一般说法，政党是政党制度的起源，政党制度是政党政治的实现形式。因此，考量政党政治，首先要分析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事实上，分析政党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指分析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形成和发展，因为，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就是源于西方。

1. 政党的起源

政党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到近现代的历史产物。政党与政党政治的重要地位，最根本的就在于它本身是作为民主政治的范畴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属于民主政治之列，是民主政治体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早期的资产阶级政党主要是伴随着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议会民主制度的建立而出现的。

英国是议会体制内政党政治的典型，也是近代中国人移植西方政党制度的典型蓝本。从历史上看，英国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先驱，议会制度肇始于英国，政党也最早在英国出现。17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在反对封建王权的斗争中建立了议会制度。在议会中，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议员，为达到控制议会的目的进行斗争，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最初，这些派别多是以个人关系为基础，即以某个

有势力的人为中心而集合起来，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1679年，英国国会开会讨论王位继承问题时，各政治派别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政治派别：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议员，他们坚决要求取消王位法定继承人詹姆士的继承权；代表封建地主和旧贵族利益的议员，他们竭力支持詹姆士的王位继承权。英国议会逐渐形成了托利党（Tories）和辉格党（Whigs）。托利党是“旧式贵族的党”，^①辉格党是“工商业中等阶级的贵族代表”^②。后来两大党在议会中互相攻击，互相牵制，轮流执政，这是英国两党制的起源。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党派政治已趋向成熟。英国工业革命后，走上政治舞台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当时的议会制度日益不满，强烈要求改革，以实现其参与政权。1832年，英国进行了选举改革，扩大了选举权。1833年，托利党改为保守党，并在各选区设立宪政协会，登记拥护保守党的选民并组织竞选，逐步演变成为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大地主和贵族利益的保守主义政党。1839年，辉格党改为自由党，也建立了近似的组织体系。自由党以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两党制的确立，是英国议会政治取得进展的标志。1867年和1884年，英国进行了议会改革，两党的组织结构日趋完善。1900年，工党成立，并逐步发展壮大。1918年以后，工党取代衰亡的自由党成为正式的反党，英国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的格局从此形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稍后于英国，美国在独立战争时期也产生了两大对立的政治派别。制定宪法之时，国会中出现了代表新英格兰各州金融和商业资产阶级的联邦党人（**Federalists**）和代表南部种植园主及北部中等资产阶级的反联邦党人（**Anti - Federalists**）。19 世纪 50 年代，形成了代表北方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党和代表南方种植园主利益的民主党。美国南北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南北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地位日趋一致，两党轮流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在美国得以确立。

法国是实行多党制的典型。18 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呈现出多党政治的势头。当时“国民议会”中就有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的派别：代表宫廷贵族利益的“保王党人”、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君主立宪派、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代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利益的雅各宾派和代表法国平民利益的“疯人派”（又称“忿激派”）、埃贝尔派。由此形成了法国历史上多党政治的传统。

英、美、法三国的政党制度可以说是议会体制内政党政治的典型。议会是资产阶级议政的中心，也是党派活动的重要场所。政党以温和的、合法的议会斗争为斗争形式，活动环境相对比较安全和宽松，党内纪律和组织状况较为自由和松散。但三国的政党政治又各具特色：英国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实行议会制。上议院由世袭或国王任命，与政党制度无关。下议院由选举产生，两党依靠竞选争夺下院席位，获多数席位即为执政党，由它组阁并掌握国家权力，获少数席位者即为在野党（或称反对党）。政府和议会是统一的，即实行议会内阁制。美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其政治制度基本上是按照

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美国政党制度的特点是：两党制与总统制相结合。两党竞争主要表现在总统的选举上，哪个党的候选人竞选获胜当上总统，这个党即为执政党。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选举产生，但两党在议会中席位的多少与执政党与非执政党的地位无关。法国政党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实行多党制的内阁制。任何一个政党无法控制议会内的绝大多数，只能与别的党派联合执政。政党数目繁多，实力相当，造成法国内阁更迭频繁，成为政局不稳定的一个隐患。

日本是议会体制外政党政治的典型。日本近代政党的萌芽产生于明治宪法制定前的全国性自由民权运动之中。1881年10月17日，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党正式成立，78名代表出席成立大会。议会制定了自由党宣言、纲领、盟约和规则，自由党宣布为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实现地方自治、争取自由民主权利和确立立宪政体而奋斗。在群众性的开设国会请愿运动高潮中诞生的自由党，以速开议会实现民主政治为目标。明治十五年三月成立的立宪改进党也是如此，“改进党……它的社会基础是都市的实业家和有知识阶层。立宪改进党以英国式的议会政治为模式，采取渐进主义立场。”^①宪法体制确立后，日本设立议会，为政党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场所。但是，由于日本藩阀势力较大，政党活动一开始就受到藩阀元老政治的压制，政党在立法和决策上很难发挥重要作用。政党与藩阀元老政治相结合，是日本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① （日）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

藩阀元老掌握着内阁总理大臣的推荐权。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日本宪政体制的日趋完善，政党在宪政体制中的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于是，二者由强硬对峙变为沟通融合。如，1900 年伊藤博文率一批下野的藩阀官僚与当时颇具势力的宪政党联合，组成立宪友政会，伊藤博文亲任总裁，并随即以这一身份组成第四届伊藤内阁。日本资产阶级政党势力大增，政党组阁大势所趋。这种模式的特点是：近代的民族国家在政党形成之前就已经建立，以争取开议会实现立宪民主政治为目标，但缺乏民主政治的传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中国影响很大，甲午战争后，为救亡图存，国人纷纷东渡，日本成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人观察了解西方的一个主要窗口，其政党政治也为当时具有比较先进思想的中国人所关注。

第三种模式是革命模式。在欧洲，意大利是典型。意大利政党的建立始于 19 世纪初期，1809 年，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成立秘密革命组织——烧炭党，其政治目标是使意大利摆脱法国（后为奥地利）的统治，消灭封建专制制度。1831 年，马志尼在法国成立青年意大利党，并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统一独立的国家，消灭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制度。这些政党发动和领导了多次起义，促进了意大利的统一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政党的产生都是这种模式。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政党是在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或在革命胜利后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社会近现代化的结果。

2. 中国人对西方政党观念的朦胧认识

鸦片战争前后，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了

西方的议会政治，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都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英、美等国家的议会组织及其职能。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谈到：英国议会分两院，有“五爵之会”（上院）与“乡绅之会”（下院），并简述了“乡绅之会”与“五爵之会”的职权范围。对于“五爵、乡绅之会，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①，魏源表示了赞许的态度。徐继畲对英国两院议会制的介绍更为具体，“都城有公会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会议，参有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币饷，则全由乡绅主议。”^②同时，他们对英美等国“国事决于公议”的多数民主制原则流露出称颂之意。在《合省国说》中，梁廷枏称颂美国“事无大小缓急，必集议而后行”。^③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也颇以赞赏的语气介绍英国，用兵、和战诸事，“必由巴厘满议允”。^④虽然他们对活动于议会内外的政党以及西方的政党政治还茫然无知，但是他们毕竟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是他们最早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信息引进了中国。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进步的社会思潮基本上还是处于只学习西艺的阶段，只有少数的维新人士兼及政治改革，对西方的

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五十一《英吉利国广述上》。光绪任寅文贤阁石印本；《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下《英吉利国》，《瀛环志略》（十卷本），光绪乙未积山书局刊本。

梁廷枏：《合省国说》卷二，《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7页。

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五十

议会政治比较推崇。当时，为救亡图存，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到西方国家直接观摩和学习，探索西方国家富强的真谛，这是中国人深化民主认识的重要环节。1875年，清政府正式派郭嵩焘使英，这是当时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一批批使外人员相继分赴法、德、美等国家。与此同时，赴欧美的留学生与出国游历人员逐渐增多，形成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稍具规模的出国热潮。他们亲历欧风美雨，颇受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和洗礼，他们通过著书立说、翻译外国政治学说、记录游历观感、书牋往来、创办报刊等方式，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自己的独到见解展现在国人面前，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政党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政党观念，作为“舶来品”开始输入中国，并在一定范围内传播。

在《出使四国日记》中，薛福成比较清晰地说明了西方议会的政党政治状况：“英国上、下议院，有公保两党，迭为进退，互相维制。公党者，主因时变通，裨益公务；保党者，主保守旧章，勿使破坏。”薛福成所指的“公党”实际上是当时英国的自由党，“保党”指“保守党”，两党互相竞争，互为进退，推动国家政治的发展。^①薛福成虽推崇西方议会，但认为“其弊，在朋党角立，互相争胜，甚且各挟私见而不问国事之损益；其君若相或存五日京兆之心，不肯担荷重责，则权不壹而志不齐矣”^②。对于政党，他们仍多视之为中国历史上的朋党，没有好感。马建忠说：“美之监国（指总统），由民自举，似乎公而

①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65 页。

②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66 页。

无私矣，乃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更一监国，则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党羽，欲望其治得乎？”^① 马建忠透出了西方政党的消息，但却也视之为朋党。而黎庶昌或许是看到了其中的不同，他说：“西洋朋党最甚，无论何国，各部大臣及议院绅士，皆显然判为两党，相习成风，进则俱进，退则俱退，而于国事无伤，与中国党祸绝异。”^② 黄遵宪则视党争为天下致乱之因，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倘能无党争，尚想太平世。”^③ 也是把政党与朋党并为一谈，这些都说明了当时国人初接触西方政党，对政党的认识是非常之浅薄。据梁启超后来回忆说，直到戊戌维新之初还多“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④。

但是，也有少许人已经认识到了政党的进步性。“孤独的先行者”郭嵩焘在出使西方的几年里，颇注意西方的政党政治，并且给予较高的评价。在日记中，他对英、法、德、比、瑞士、土耳其等国家的议会情况均作了详略不等的论述，他还多次到英、法、比等国议院旁听，对政党政治有了切身的体验。在日记中，他有十几处记载了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强国的政党政治。在记述英国两党情况时，他说：“大抵英政分之二党，一主时政，为新政府毕根士由一党；一专攻驳时政，为旧政府南斯顿一党。其议政院座位竟亦分列左右，右为新政府党，左为旧政

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164页。

黎庶昌：《西洋杂事》二十五《日国更换宰相》，岳麓书社1985年版。

转引自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7页。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7页。

府党，而列入新政府党常多，其权势所趋故也。’^① 有关英国政党政治的情况，郭嵩焘也作了详细的叙述，“英国旧制，会绅士和宰相异议，宰相不从，则相与散会堂，再举再议。如仍不从宰相，宰相不复安位矣。凡会堂必明分两党，有附宰相者，有与宰相持异议者。而尝取二者之数以准，从者多而事行，不从者多而事不行。遇大议不协，则会绅请退；再举仍不协，则宰相请退。从前格兰斯顿之退，亦如此也。’^② 在日记中，郭嵩焘对西欧一些国家的政党政治描述得很详细，而且初具系统性，对西方政党在议会政治中的作用及其公平竞争的原则都有所认识。同时，在其如实记述的过程中，称羨之意时而溢于言表。他称赞不同政党之间“相互驳难，以求一事，用意甚美”。在他的笔下，西洋“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立议院，即分同异两党，使各竭其意志，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柄政者亦于其间迭起而争胜。于是两党之争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部难酬答，直抒其情，无有隐避。积之久而亦习为风俗。……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深矣。世安有无政治教化而能成风俗者哉？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神所聚，良有由然也。”^③ 由此可见，郭嵩焘对当时西方政党和政党政治已经能够作出比较客观真实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182页（光绪三年二月三十日）。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8页（光绪三年八月初八条）。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3—394页（光绪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条）。

的评说。

总之，甲午战争前，一些力主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西方的政党政治。虽然他们主观上并无将此传播给国人的意识，甚至对这种政治还抱有怀疑的态度。而且从传播意义上讲，基本上没有听众，没有读者，知之者甚少，算不上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党知识的传播。但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西方政党和中国朋党的不同，认识到了政党在议会中的作用及相互公平竞争的原则。尽管这种认识还停留在初遇的惊异和表面的观察上，但是这毕竟是开启了中国人了解西方近代政党的大门。

3. 西方政党观念的输入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怀着对国家命运的深深担忧，勇敢地冲破清政府的禁令，先后建立了许多团体，创办报纸、杂志。同时，受《马关条约》的刺激，一些封建士大夫从过去的醉生梦死中幡然醒悟，开始议论时政，参与变革。一时间，报纸、学堂、学会层出不穷，形成了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的基本空间。应政治革新的需要，西方的政治思想开始大量输入中国，报纸和译书是当时西方政治思想输入中国的主要媒介。

首先，就创办学会而言，维新派创办的主要报纸《时务报》、《湘学报》、《国闻报》对西方立会兴盛作了较详尽的说明。在《时务报》上，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论学会》一文，指出，学会中国古已有之，“学会起于西乎？非也，中国二千年之成法也。”否定了传统的集会结党亡国论。梁启超认为西人因有学会而强盛，“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强调“今

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① 在《南学会叙》一文中，梁启超也有类似的文字：“乃博观于泰西，彼其有国也，必有会。君于是焉会，官于是焉会，士于是焉会，民于是焉会；旦旦而讲之，昔昔而摩厉之，虽天下之大，万物之多，而惟强吾国之知。故夫能齐万物而为一者，舍学会其曷从与于斯。”该文章发表在《湘学报》和《时务报》上。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指出：“泰西国势之强，皆借民会之故”。1896年，汪康年拟定了《中国学会章程》，建议朝廷颁布实行，提倡“布衣议论国是”。通过设立“学会”的形式来达到“结群”的目的，从而制造声势，组织骨干，实现维新变法的政治追求，是康有为等人在戊戌时期的设想。1895年的“公车上书”是对清王朝禁止布衣干政、禁会律会的公开挑战，标志着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在各地组织了大批的会社，出现了“学会林立”的局面。与此同时，维新派对正统的“君子不党”的观念以及清政府厉行党禁的政策进行了批判，合群立会以牖启民智，开通风气，救亡图存的“合群”观念开始盛行起来。一批新式学会诞生。如强学会、保国会、湘学会等。这种“学会”尽管大多数是士子文人、朝廷官员、社会贤达的集结，但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求取功名，而是直接研习政治，关注国事，甚至力图干预或参与权力中枢的运行。其活动方式从一开始就是公开的。从这类学会的政治性、公开性、开放性等特征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学会》，《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9页。

看，它们已经具备了近代政党或政团的一般特性。

其次，就政党思想而言，在维新派创办的各种报刊上，介绍国外政党和政党活动的文章、消息时有所见。1897年1月

《时务报》刊登了译自《大日本杂志》的《政党论》一文。这篇文章开宗明义，说明政党是时代进化的产物，是立宪政治的伴生儿。“君主专制，黔首无力，国家以愚其民为能，不复使知政治为何物。当是之时，安有政党兴起哉？及文明大进，世运方转，教化浹洽，国民智慧渐起，类能通晓治体，而国家亦令国民参与大政，相与议论，于是乎政党始兴，盖必然之理也。

何则？政党之于立宪政治，犹如鸟有双翼，非有立宪之政，则政党不能兴；若立宪之政，无政党兴起，亦犹鸟之无翼耳。”

关于政党的本性和特征，该文指出：“政党者，本欲籍手于国家之政治，以宣发其志愿。故同其意见者，相与协力以出于一途。约而言之，政党者，欲把握国家权力，而遂行其志愿，故联合同人为一党也。政党之本志，欲主持国家之机轴。”^②有鉴于此，政党不同于权力中枢中官员争权夺利的“私党”，因为“私党”手段险恶，“在牵制君主之肘，以营利于其间”；而“政党”“光明正大”，以国家政治为本志。政党也有异于虚无党一类的由下层民众组成的旨在颠覆专制政权的革命党组织，“偶有民人结作一党，而反抗君主之权，以强逼君主，是革命党耳，非我所谓政党也”。说明了政党与朋党、革命党的区别。与此同时，《时务报》对美、日、英等国家的政党都作了介绍。如：《时务

① 《政党论》，《时务报》（17），1897年1月。

② 《政党论》，《时务报》（17），1897年1月。

报》所载：“美国统领，定制四年一举。国有两党，一曰合众，一曰共和，各原举其党人以任斯职。”^①“日人向分两党，其帜不相能之处，实与英之守旧维新无异。”^②在《湘学报》上，唐才常发表了《各国政教公理总论》一文，他在介绍西方议会的同时也涉及了英法的政党。法国“其国之党三，曰君党，志复君权者；曰民党，志保民权者；曰中党，中立二党间，无成见者。三党遇事辄齟齬，然以可否之多数定义，亦率无来办”。英国“政以党成，其党二；一曰公，二曰保。公党者，因时变通；保党者，守旧勿拓。二党视宰相新旧进退之，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事乃济于平。”严复在天津《国闻报》上发表的《论中国分党》也对政党与朋党作了区分。译书方面，已有前一阶段重西方科技而转为重视西方政法。1896年，梁启超编《西政丛书》、王奇英编《时务通考》，均介绍了西方议会与政党。

以上表明，这一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政党的认识已经加深，不再将政党与朋党混为一谈。特别是他们开始使用大众传媒的手段，使信息扩散，就知识分子人群讲，覆盖面极大。据方汉奇统计，《时务报》最多时每期销达17000份。^③可以说，前述三报，开了中国传播西方政党政治之先声；一些知识分子们也公开组织维新团体，广泛开展活动，开通了风气，为此后各种团体的出现以及政党观念的引入和传播准备了条件。

4. 西方政党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赴日本留学和到日本参观的国人越来

^① 《时务报》第3册，第49页。

《时务报》第3册，第49页。

^③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越多，鉴于日本变法成功多依赖于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切实了解，通晓日文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留学生）便把间接译介西方重要的政治典籍看作当务之急，报纸、译书仍然是他们传播西方政治的主要阵地。庚子事变后，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清政府开始推行所谓的“新政”，颁布一系列旨在发展经济、改革政治的文件，宣布预备立宪，从而为政党观念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主要西方著作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穆勒的《论自由》、斯宾塞的《代议政治论》、伯伦之理的《国家论》等；日本人的著作有：《政治原论》、《国法学》、《万国宪法比较》、《英国宪法论》等。1900年以后，官方开始提倡翻译政法方面的西书，因而此后一两年中关于政法的译书大增，据顾燮光著《译书经眼录》统计，自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901—1903年），共译书533册，其中史志115册，法政70册，学术48册，占前三位。^①政党方面的译著有《明治政党小史》（上海广智书局），《欧美政党论》（镜今书局）。译书方面以严复的成就最大。严复自1897年译出《天演论》，在1901年以后的六七年中，又相继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Edward Jenks的《社会通论》等著名思想启蒙大作。在这些书中，关于结社组党有不少议论。如：《社会通论》中提到政党有五大功能：“吾国之政法，尚有一最大之机关，缘之以起，则政党之分是已。……言政党之利国，可更仆者不一端已，约而举之，则国中之民，于门户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0页。

各有所分属，以胜负之为用，于国事皆有所关心，一也。政府行事，万目睽睽，常有其伺察监视之者，不敢放恣，二也。民之于国，其才智各有所施，其喜功目试之心，常有以自达，而民德不至于腐败，三也。饶实之民，与高材硕学者，常与国同休戚，爱国之意不劝自深，四也。人人有国家之思想，视国事同于己私，故代表制既立，不至于名存实亡，五也。”^①

这一时期的重要报刊有《清议报》、《新民丛报》、《中外日报》、《国风报》、《湖北学生界》（第 5、6 期改名为《汉声》）、《浙江潮》、《二十世纪之支那》（后改为《民报》）等，均有关于政党的内容。在当时没有广播电视等现代化通讯手段的情况下，报纸是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它比书籍快捷；比演讲、传单的影响面大；读者固定。所以，近代报刊直接导致了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报刊宣传的特殊认识，报纸可以使“君意和民情上下通达”，可以“开启民智”，即报纸有益于国家。因此，中国近代报刊的直接功能不是传播和交流信息，而是近代政治家们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使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体现出一种“政党化”的特色。从 1903 年起，新式报纸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报刊大量增加，知识分子开始以主动的姿态介绍和传播政党观念和政党政治，“非立大党不足以救将灭亡之中国”的认识出现了。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因其救亡态度和变革中国的方式不同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这两个派别的知识分子在介绍和传播中有

① 《社会通论》商务印书馆 1903 年版，第 163 页。

② 《清议报》第 78 号。

不同的侧重，他们分别组织的政党也有明显的区别。革命派沿用了会党的秘密组织形式建立政党；而改良派则是寻求公开的、合法的途径组建政党，因而有了所谓的“革命党”和“政党”之分。

改良派（后为立宪派）的传播媒体主要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当年12月下旬即发刊《清议报》。《清议报》自创刊到终刊，前后历时3年，共出100册。该报在海内外共设有38个代售处，发行量“经常保持在三千份到四千份之间”，^①内地还有翻刻，故难有准确统计。立宪派热衷于立宪政治的实际行动，因而对政党政治极力推崇，其宣传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清议报》第28号的《政党说》一文，是继《时务报》的《政党论》后的又一篇政党专论。文章说：“天下者，党派之天下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欧西各国政治皆操于政党。政党者，聚全国爱国之士，以议论一国之政。凡设立内阁，则内阁之大臣，皆政党之魁首；召集议会，则以代表民情，则民情无微而不达。故文明之国，但闻有无国之党，不闻有无党之国。”这不免有些言过其实，但他们所认为的“方今东西诸立宪国之主持国事者……实则行政之方针冥冥中均为多数之政党所转移”。^②可谓看到了政党的基本政治作用。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该报自创刊到1907年7月终刊，前后历经6年，共出96期。《新民丛报》能在国内外公开销售，加上梁启超的文名越来越高，

①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中国台北三民书局1989年，第202页。

② 《论今日亟宜组织政党以促宪政之进行》，《申报》1910年4月27日。